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四四期 ——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12d)

---

【不堪回首】“自杀潮”中的恩怨录 (上)

刘建亭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不堪回首】

“自杀潮”中的恩怨录 (上)

• 刘建亭 •

◇ 序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在大会上鼓吹“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要维护和增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从而重新助长了极左思潮泛滥，刹时一场腥风血雨的镇压恶浪席卷全国各个角落，社会上和各单位中极少数的打砸抢分子充当了急先锋。

我所在的县立第一中学，教职员工共五十人，而当天夜晚有三位中年教师因不堪人格的侮辱，肉体的无休止的百般折磨，和有冤有苦无处申辩的绝望中，采取了自杀的手段，以死表达自己的抗议，其中有两位教师从三楼跳楼，一位教师因脑浆破裂当场死亡，一位教师因脚先落地伤残一条腿，另一位教师悬梁自尽，因绳子断了，死而复生。仅五十人的单位有三人自杀，我就是“自杀潮”中块肉余生的一员。

在“自杀潮”中，我遇到的恩人们，其中有熟知的，有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还有不少不知姓甚名谁的。有的恩人告别了人世，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什么也不知道。自1968年至今已有三十四个年头了，我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在漫长的三十四年中，我经常回忆这段经历。每当回忆时，我的泪水同当年一样的流，我的情同当年一样的深，总想在我辞别人世前，在恩

人们面前表达深埋在内心的知恩报恩的感激之情，特别想得到不知姓甚名谁恩人们的回报，祝愿人们一生平安！

## 一、自杀潮前夕，“小皮袄”撞进了人间地狱之门

1968年3月下旬，远离约二百里外的妻子即将临产，几经请求，方得到军宣队谷政委批准十日假期，26日急速回到妻子所在的地区城市。我回到家门，见到妻子已是腹大如瓮。妻子说：“总算盼到你回来了！”八岁的大儿和五岁的小儿细声对我说：“爸，缸里没有水了！”我急忙操起扁担，挑着两只空水桶，到巷子口的公用水龙头买水，来回三趟，总算将水蓄满了水缸。我喘息未定，对大儿问道：“街上的那位大哥还挑水卖吗？”大儿摇摇头说：“他疯了，早已挑不了水了。”我问：“谁给你们挑水？”大儿悄声说：“前天妈挺着大肚子挑水，你回来就好了！”我心口顿时感到疼痛，心想：“我走了，全家的用水、喝水怎么办？”大儿人虽小却很懂事，劝说：“爸，你不用犯愁，你给我买一根小扁担，我能挑水”。大儿才八岁不到，一米一、二的个头，比那只大水桶高不了三十公分，我怎么舍得让还是幼儿的心头肉担当如此重的家务劳动？！但在那乱哄哄、打打杀杀的世道，家家愁得像热锅里的蚂蚁，谁能帮得了谁？大儿的建议是一条唯一能解决用水的难题。我有点抽噎地说：“爸这就替你买去！”我几乎跑遍全城大小土产店，最后找到了一堆只有一米来长，两个指头半宽的小扁担，我挑了一根东北榆木的，又看到旁边有几只空油漆桶，份量很轻，约有六十公分高，正好同大院那只小水桶配对。我将小扁担和油漆桶拿回家门时，两个男孩子高兴地跳起来，嚷着要我在扁担上配上挂钩，在油漆桶上安上把子，两个孩子争着将大院的小水桶提来，挑起两只空桶，一溜烟似地跑了。我不放心，追到了水龙头供水小屋，两个孩子等着我缴了一桶水钱，先将油漆桶装满水，我提起桶，将水倒入另一只空桶，分成了两个半桶水，大儿争着打头阵，我心痛地看到大儿将水桶挑起，桶底刚刚离开地面。大儿挑着两只水桶，挺起他的小胸脯，踉踉跄跄、东摇西晃地走了十几步，停住脚喘气。五岁的小儿说：“哥，我来！”老二比老大小三岁，个头却同哥差不多高，只是身躯精瘦些。老二挑起水桶，挣扎着走了五、六步，放下扁担说：“哥，我不行了！”大儿从小很有志气，他接过扁担，挑起水桶就走，我在他身后跟着，几次眼看他挺不住了，但他稍微缓过气，又继续挣扎着往前走，就这样一摇三晃地，居然将水挑回到家门口。我将那半桶水倒在旧油桶里，将水提进屋内，听见两个小儿在里屋争着说：“妈，往后不用愁水了，我们能挑水。”妻子充满母爱而略带责备的口气说：“我看，让我看！还说会挑水，你自己看，肩头都红肿了。挑不动就少挑，不要逞能，我给你们做一个垫肩。”说罢，妻子的说话声已经被轻声呜咽替代了。

妻子从里屋走了出来说：“今晚就吃顿面条，做个蛋花汤，算是替你接风！”说罢从碗橱里拿出两个鸡蛋。我赶忙捅开炉子，烧水下面条，当面条煮熟后，我拿着两个鸡蛋，犹豫了一阵。因为当时买肉和鸡蛋都要凭票供应，人们平日副食品供应量少得可怜，眼前家里的菜刀已是锈渍斑斑，可想前段日子妻儿是活得够苦了。我左思右想，一边放上炒锅，倒入几滴油，熟葱花，然后把锅里放满水，加入盐和少许酱油，盖好锅盖，等水烧开。当我将第一个鸡蛋磕开，打入碗里，我再也不忍心打入第二个鸡蛋，因为妻子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家伙，她最需要营养。我将一个去壳的鸡蛋用筷子反复搅动，使蛋黄和蛋白成为稀薄的黄水汁，锅里的水滚开沸腾之后，我将鸡蛋汁慢慢地滴在往上沸腾的水柱上，一刹时水面上浮着大块的鸡蛋花，再将那个鸡蛋壳磕破，将蛋囫圇放入锅内。我先将孩子的两碗面条盛满，浇上蛋花汤，接着拿出一个大碗，先将一个荷包蛋捞出，倒入碗内，上面盛满面条，浇上蛋花汤，方叫妻子用膳。妻子艰难地挪步出了屋，小儿三五下已将面条吞入肚内，喃喃地对哥哥说：“真香啊！”我又给小儿盛上第二碗面条，再浇上蛋花汤，但汤只是带点油的黄水罢了。忽然妻子发问：“怎么你只做了一个鸡蛋？”我看见妻子的面条碗底已露出了荷包蛋，轻声说道：“你是两个人”。小儿狼吞虎咽吃完第二碗面，看见母亲的碗底还有一个荷包蛋，两眼瞪着荷包蛋，一动也不动。妻子本已将荷包蛋拨到唇边，看到小儿那副馋嘴样子，便放下碗，说道：“你和哥哥一人一半”。边说着，边将荷包蛋拨到小儿碗里。小儿一口将荷包蛋咬掉三分之二，他将剩下的一小块蛋白夹着一丝蛋黄，拨入

大儿碗里。哥哥对弟弟说：“爸还没吃哩！”说罢，将剩下的那小块荷包蛋放入我碗里。我看到小儿还伸着细长的脖子，盯着那一小块蛋，我将它又拨回到小儿碗里。我一边吃着面条和汤，一边想：我四七年在大学里就偷偷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毛主席写的几本小册子，为了信仰，我千方百计投奔共产党，参加了解放军，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我和我的同时代的年青人含着喜悦的泪水，欢呼从此民族可复兴，国家定富强，人民将幸福；可整整十八年过去了，毛主席究竟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才满意。想到这，我猛然记起公安六条中的第一条就是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我使劲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自言自语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日理万机，哪有时间来打理普通职工的这些生活屁事！”

转眼间已是二十九日夜晚，妻子对我说：“你送我去医院，怕是今夜或明天，孩子要降生了！”在那个年代，那样的中小城市，况且是夜晚，没有任何公家的或私人的交通工具，人们有任何急事外出，只能依靠两腿和两轮。我将自行车推出街门口，车的后座上垫了一床小棉被，扶着妻子，坐上车座，我推着车，护送妻子去医院分娩。天正下着毛毛雨，路程约有四里地远，途中要经过两条曲折小巷，上了马路，过了公路大桥，便是半里远的上坡路，一路上几次险些将妻子晃下车，好不容易到了医院，挂上产科号，办好住院手续，已是子夜。我拖着疲乏至极的身子返回家，回到家时，两个孩子已熟睡。我倒在炕上，整夜不能入眠，心里惦记着妻子，求上帝，求菩萨，求毛主席赐福，保佑妻子平安顺产！

天蒙蒙亮，按照妻子的嘱咐，做好一锅疙瘩面汤，打入四个鸡蛋，加上两匙子妻子准备好的猪大油，倒进一个大茶缸内，匆忙上路。我到了产房，看到妻子已坐在床上，我忙问：“生了？”妻子微笑说：“我们盼望已久的‘小女儿’来咱家了！”我情不由主地喊到：“我的‘小皮袄’啊！爸爸的小心肝！”这时心头对“文革”动乱的恐惧一扫而光，我和妻子一同沉醉在新添女儿的幸福喜悦之中。这种享受人类天伦亲情的快乐，只有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未出得医院大门，便看见几个上了年纪的医务人员在几个造反派监督下，低着头双手握住大竹扫帚扫街，出了医院大门不远就是一所中学，从校园里不断地传出斗“牛、鬼、蛇、神”的喊声和吼声，沿途上不时地看见造反派和红卫兵押着一串串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牌子的人游街示众。整个城市又动乱了，疯狂了，战栗了！我回到了现实的人间，心情黯然失色，我的可怜“小皮袄”生不逢时，错投了家门和时代啊！最令我不安的是内心的惶恐和歉疚，我给我刚出生的掌上明珠提供的却是如此困苦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不知道她将如何活下去，能指望谁呢？只有指望毛主席老人家超生啊！

## 二、谁也扼杀不了人类之间的感情连结

妻子坐月子期间，理应有足够的营养补充才能提供乳汁，但全家长期积攒下了两斤肉票和三斤鸡蛋票，按照妻子的叮咛，为了要买点肥肉，一天天未亮我就到肉案子前排队，挨上第七号。一直到八点钟，一个大个子中年人推着一只猪后腿和前腿以及一些零星肉来了。他摆好肉案，挂上猪腿，开始供应肉。他先卖猪的前腿，前六号都是依次割前腿肉供应，瘦肉较多。我交上票时，他顺手将刀尖插进肉里，我的眼睛里只看到后腿肥肉，情不自禁地脱口央求说：“大哥，家里女人要坐月子，想割点肥肉膘，下奶！”那汉子转过脸，瞅着我。这时我才看清楚对方长了两条浓眉，一双豹子眼，一脸大络腮胡子，正像《水浒传》里卖肉的镇关西。我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冷战，后悔不该开口，自找没趣。那人上下打量我的模样就像掂量挂在钩子上的肉，大概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后，把刀尖抽出，转身向后腿肉，从肥肉处，一刀割下一块大肉膘。他一边称肉，一边问我：“是带把的小子？”我怕回答错了，惹得对方不高兴，或许把割下的肉收回去。于是讷讷支吾搪塞，那人笑说：“养个‘小皮袄’，老了才有靠，更好嘛！”说罢，又拣了块板油搭上，用纸包好递给我。我喜形于色，不住地喃喃：“谢谢，谢谢！”我拎着篮子又转到家后街拐弯大树下的粮店，看到店面地上摆着三箱经石灰水泡了的灰不溜丢鸡蛋。一位中年女店员问我：“买蛋？”我似乎鼓足了勇气，回答道：“我有三张蛋票，想买新鲜点的，伺候女

人过月子！”那女售货员说：“很面生啊！”我回答：“前街三号门牌。”她喜悦地说：“十二姑娘生了？”原来，三号门里六兄弟生了十三个女儿，我妻子排行十二，可说是远近闻名的女儿院。我忙说：“原来大婶早认识我妻子！”女人快言快语说：“哪能不认识，她姐妹从小到大，上学、上班都打我店门前过，是老邻居哟！”说完，接过我手里的篮子，进了店里仓库，好大一会儿，那大婶手里提溜着盛着满满鸡蛋的篮子，放到货架子上的秤盘上。我看到篮子里的鸡蛋呈灰红色，的确那大婶从仓库里拿出来的鸡蛋新鲜多了，感激之情油然而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连声说：“谢谢大婶关照了！”那大婶叹气说：“坐月子的女人只吃三斤鸡蛋，奶水怎么够养孩子？当年我养孩子，一顿便要吃八个鸡蛋。时下农民都不敢养鸡，哪来的鸡蛋？有钱也没处买，真是作弄老百姓。原本好端端的日子，被搞得乱糟糟的。”说罢，那大婶已称足了分量，我接过篮子，道谢返身要走，那大婶顺手拿了三个鸡蛋，放进我的篮里说：“我的一点心意”。三个鸡蛋值不了几个钱，但当时物资严重匮乏，全凭票供应鸡蛋，有钱也没处买，大婶的三个鸡蛋，反映了邻里间的情谊，这是人类社会，一种相互关心、帮助、无私的自然表现。

不几天，我接到了本单位一个造反组织的勒令，命我速返校，接受批斗的通知。使我从获得片时回暖的人间，重又坠入惶恐多时的万丈深渊之中。因为在派性斗争激烈的那段日子，我曾接受我所参加的“东方红”造反组织王二头头的命令，写了一张针对另一造反组织“红教联”的大字报。“红教联”垮台后，“东方红”成了学校唯一组织。复课闹革命之后，驻地空军某部派军宣队进校，替代了原支左部队，经过数月的时间，学校秩序明显好转。不料平地一声雷，“杨余傅”事件后，派性间的斗争又激烈展开，军宣队支持“红教联”。“东方红”有的头头与红卫兵造反总部的学生关系较好，他们对军宣队有反感。我离校前，已觉察军宣队为了控制局势，防止红卫兵再动乱，首先要从支持红卫兵的“东方红”教师组织中找一个突破口。“东方红”的三个头头出身好，所以军宣队只得在头头之外，抓一个替罪羊，我自然成了首选目标，因为我是组织中一支笔。

为了怕妻子担忧，我简单告诉她，学校要我回去。妻子是工人，思维较简单，但她知道学校里的政治运动历来都比其它单位搞得凶，她忧心忡忡地说：“我的身子已逐渐壮实了，就是担心你出事”。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大风浪形势下，夫妻间相互慰藉的绵绵私语，通宵达旦，没完没了。我考虑这次可能是一次人间的生离死别，每看到三个年幼的儿女感到格外的亲切，特别是我那出生十余天的小女儿，每动一动小腿，摇一摇小手，撅一撅小嘴，都使人又喜又忧，恨不得带着全家老小五口，逃到无人烟的荒岛，过着《鲁宾逊漂流记》中那样极其凄苦，但自由自在的人类生活。八岁的大儿已学会生炉子、封炉子、挑水和洗衣服的家务劳动，五岁的老二天生一双大手，妻子已教会他和面、揉面、发面、加碱和做馒头的一系列本事。当第一次我看到端上老二小手做的满蒸笼馒头时，全家都高兴得哭了，我搂住两个孩子说：“爸算是放心了！”临别的那一夜，整夜没有合眼，左顾右盼，看到左边已入梦乡的两个幼子，如同一对玉雕小天使，这样小小年纪便失去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担负起成年人做的种种家务。回过脸看到右边长得比苹果还美的小脸蛋，如果生在风云人物的家庭，定有“小格格”般的花样年华。要哭没有眼泪，要泣不成声音，一个做父亲的男人对自己即将面临生死未卜的厄运，拖累三个无辜小生命的内疚，如同有人将一块烧红的铁棍捅进我的心脏。对妻儿忧心忡忡，对前途伤心绝望，多么希望要把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应该了解在他的统治下，一个最普通职工的伤心绝望情况。我不知道当年他老人家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对“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解放自己，是怎样理解的？”我不敢想下去，我想不通！

四月中旬的一日下午，我决定返校。向妻儿告别时，妻子两眼圈盈满了泪水，反复央告和规劝说：“别按照自己的性子硬顶，什么罪也要挺下来，我和孩子等你活着回家！”我默默无语，一一点头，以示应诺。妻子把怀中的女儿递给我，我用脸颊轻轻地、紧紧地亲着女儿的小脸，亲了又亲，盼望女儿茁壮成长。我忍住涌出的泪水，将女儿送回妻子的怀里，扭转身，快步迈出门。两个幼儿紧随其后，送出了大门口，送过了曲折小巷，送到了大路边。我不让孩子再

送行了，蹲下身子，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两手臂将孩子搂紧，轻声告诫孩子说：“爸走了后，你们不要贪玩，不准出门乱跑。要听妈妈的话，帮妈照顾好小妹妹，全家的重担托付给你们了。”大儿呜咽说：“街上的孩子骂我们是黑仔子，早不同我们玩了。我和弟弟一定听妈的话。爸，你放心，……。”我已是泪流满面，不住地亲着两个孩子的脸。我站了起来，说道：“爸该走了，你们快回家，免得你们妈挂心！”两个孩子拉着我的手，问道：“爸，你什么时候再回家？你要快回来，我们会想你！”我说：“爸说不上什么时候能回来，爸要是回不来，你们要好好活下去，要争气……。”我再也说不下去，转身快步奔向火车站。

### 三、致我于死命的第一张大字报

当日，我约傍晚前回到学校，在学校教职员宿舍院的走道上，劈头碰见三结合的干部代表总务处张主任，在运动初期原本是同一观点的朋友，平日有说有笑，无话不说。我正想主动向他打个招呼，谁知张主任把头一扭，板着脸，擦肩而过。张主任严肃的表情，完全证实了前些日子我心里不安和惶恐的推测，在大祸临头，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一个没有任何权势的普通教员来说，只有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了。我回到宿舍，拎了水壶去打水买饭，出了大门，街斜对面就是学校教学区南院，进了南院，迎面看见大联合后的政治部主任王二头，正在政治部办公室窗下的墙上，贴着方桌大的大字大标语，写的是“把我校的反革命两面派揪出来示众！”我心里一时纳闷：为什么给我戴上“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我反复思考，想弄明白这顶可能经过精心酝酿而定罪的帽子，定有蹊跷。

我躺在床上，捉摸了半夜，方清理出了头绪，给我戴上这顶帽子，可以将我在大学时反对蒋介石的学潮中，上了黑名单，后来积极主动参加解放军的这段进步历史，说成有意识钻进革命队伍；更可以否定我在解放军中荣获二等工作模范、志愿军三等功臣和多次市县教育先进工作者的功绩。一旦给我戴上这顶大帽子，便没有一个人敢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同时还可挑起平素对我印象较好的师生员工的误解，我成了众矢之的。我对王二头首先向我发动攻击，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王二头就是我原先参加的“东方红”群众组织的第二把手，轰垮“红教联”群众组织之事就是他与地区造反总部头目李某某密谋策划的，王二头命令我写的那张“轰垮”大字报，三易其稿，仍嫌文字内容软弱。最后我拒绝再修改，并说：“再要加强火力，便是扩大对人身的攻击，我不能干！”归根结底惹起众怒的那张大字报主谋是王二头，现在他主动向我开刀，玩的是嫁祸于人、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的勾当。

次日两个红卫兵勒令我滚出去看大字报，我走出教师宿舍院的南大门，大街上南北两院的外面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进得南院大门，校园四周墙上更是密密麻麻的，真如戏台上的武生戏，长靠短打，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很是热闹。我匆匆浏览一遍后，默默统计了一下：揭露我祖宗三代的长篇并列成图表的大字报，在校内外墙上各有一幅；批判我在文革中罪行的长篇大字报，也是内外墙上各有一篇；中篇的大字报占多数；三言两语漫骂式的大字报为数不多。我发觉写大字报的人除了批判我文革中罪行的那张长篇大字报出于原“红教联”李老师的手笔外，另有我熟识的两人，一位是副校长，另一位是同一教研组的王老师，他们俩有点历史问题，还有一个不甚熟识的数学李老师，因其家庭成份不好，也写了篇冗长的论述我天生反骨的文章。其余写大字报的人大多是不相识的，他们是新合并进来的原职业学校老师。平日与我最相识的，特别是同一教研组的老师们没有写我的大字报。这次针对我的批判应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动员、发动的过程，这些老师居然按兵不动，不肯参加打落水狗的行列，我心里感到安慰，并充满着对他们的感激。如与我原派性观点不同的栾老师完全可从站在对立的立场对我揭发和批判；秉性容易冲动和说话无边的小赵老师，自己出身成份也不好，按理为了自保，也该挥笔助战；我的中学时的老学长朱老师脾气急躁，以往对其教学也有微辞，正可借此时机，予以报复；特别是年过花甲的柴老，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大可与其他有问题的人一样，积极响应号召，大批大揭一通，以求自身安全。他们都不肯抓住我平日难以避免的言行错误予以歪曲，

无限上纲。这些老师们当时置身度外的态度使我深深感到一个人的品质优劣，只有在这种场合下，才能真正显露出来。由于三十年前的经历早已事过境迁，没有机会向我那英语教研组的老师们亲口谢恩，现在祝愿老师们一生平安和幸福。特别是已故的柴老，曾在以后多次小组批判、揭发和检查会议上，从未违背良心和事实，乘人之危对我攻击，借此在我记忆犹新的柴老遗像前表达对恩人的凭吊：柴老德行，永垂不朽！

我回校的第二天，以军宣队支持的主流派一方企图以大字报形式搞臭我，以达到压制红卫兵和“东方红”派教师的目的第一战役结束了。其实揭发我历史方面的材料，都取之于1953年我在朝鲜战场申请入党时所写的历史自传，揭露批判我文革中罪行条款中，除了那张针对“红教联”的大字报之外，还有当时支左部队在学校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东方红”的头头们推举我发言，并在我发言稿上加上了几句当地武装部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言词，根据以上事实就是我的现行反革命的罪证材料，但无论在当时或现在，文章出之于我手，发言出之于我口，我诚恳认错，并赔礼道歉，请你们原谅！

#### 四、中央文革把运动推向最疯狂的自杀高潮

学校中前后被揪出的“阶级敌人”有六人：有两位老师在运动开始不久便被揪出批斗，一直未解放；有从抗日战争初期，投身革命，一直从事教育事业的老校长；有三位老教师，其中包括年近花甲的语文教师陆老，五十余岁的数学女教师宫老，和四十刚出头的我，我教英语兼教研组长。我们六人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会基础，又是当时阴谋反对和推翻毛主席的右倾翻案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

四月十七日早晨，几个早已毕业逗留学校的红卫兵，将我们分别从牛棚和宿舍里赶出来，命令我们一字排开，给我们挂上写有姓名、罪行的大木板牌子，戴上纸扎的五颜六色高帽子，排头老校长的高帽子上还特意加上两个纱帽翅，一人给一面小锣和锤子，扛上长板凳，然后把们拴在一根长绳子上，自己敲着小锣，由几个穷凶极恶的红卫兵押着游街，每到一处十字路口，便停住，放好长板凳，首先被绳子拴住的老校长，站上长板凳，自己一边敲着小锣，一边向过往行人通报自己的姓名，交待自己的罪行。我受了这样奇耻大辱打击之后，回到宿舍，义愤填膺。当年部队首长经常教导，“在敌人面前，宁愿站着死，不可跪着生”，但现在站在面前的人是被鼓动和调唆发狂的学生，他们被封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保卫毛主席的卫兵，而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捏造成比拿枪的敌人要更危险。在京剧舞台上地狱里的鬼魂有时也有机会请求判官审理冤屈，在文革中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向谁伸冤？没有。只有任人侮辱、宰割的一条路，这条路怎么会是毛主席亲自创造出来的人类文化最‘伟大’的道路？

我喘息未定，有两个初中学生勒令随其身后，前往他们班，接受批判，那个班的班主任是原“红教联”组织中最执着的青年教师李老师。“红教联”垮台之后，他憋足了一肚子怨气，对我恨之入骨，所以我成了他的班批斗的首要人选。教室讲台前有一个凳子，叫我站在凳子上，低头弯腰，接受批斗。他简单地声色俱厉批判和漫骂一通，骂人不解恨，返身狠狠地打了我两耳光，又将我的帽子摘下，扔到地上，重重地跺了几脚，严厉地对学生说：“你们要继续狠狠地批斗！”说罢，悻悻走出教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众挨打，也是学校吹起武斗的第一次号角。李老师的本意是发动学生搞武斗，并向学生们起一个示范打人的样板，暗示学生可任意打人，因为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对‘敌人’就是要狠打。李老师青年气盛，而我又伤害过他的组织。他报复心太重，在以后连续五年中，一直要致我于死命，但他没想到他的第一次报仇雪恨的计划竟然落空了。他走出教室后，教室里的学生立刻喧哗热闹起来，我偷眼环视一下，见学生都拿着棍子或柳枝，三三两两嬉笑打闹，女学生大多在座位上取笑斗嘴，只有两三个较顽皮的男学生，手里拿着长长的柳条，围着我，用树梢拂着我的脖子、脸部和耳朵逗乐，他们玩了一阵，见我没有丝毫反映，老大没趣，跑出教室外去玩了，好大一阵子，没人

再捉弄或答理我。有两个班干部的学生走到我面前，说：“你回去吧！”我跳下凳子，拾起被李老师踩踏在地上，满是泥沙的帽子，向学生们鞠躬，走出教室外。我很感激这些十四、五岁童心未泯的初中学生，如果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痛打我，轻则皮开肉绽，重则骨折肢残。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听到从其它几个教室里传出的阵阵批斗人的口号声，我明白把我们六人分到班里批斗，是统一计划的一个步骤。

我回到房间，刚坐下，想舒展一下腰，有人敲门，进来的人是我的高二班的学生小孙，他是在本校初中学过三本初中英语教材的六个学生之一，我为了免除他们无谓重学，单独为他们采用了继初中课本编写的高中新课本，取得教务处同意后，在课余时间单独为他们授课，计划他们读完高二，保送他们考大学英语系，我又兼二班的副班主任，所以我同他们和全班同学的关系融洽，感情深厚，文革运动开始以来，二班同学一直是保我的。乍见小孙，心头吃惊，小孙轻声有礼貌地说：“老师，同学们在教室里等你！”我暗自嘀咕片刻，跟随小孙到了教室，学生静静地坐在各自座位上，后排有几位平素说得来的“东方红”组织的老成员，当然没有王二头和其他两位头头。主持会的学生要我交待全部历史，我交待时，没有一个人插话，更没有漫骂和高喊口号声。我讲完后，几个学生头头同后排坐的几位老师商议了一会儿，便叫小孙将我带回宿舍。我猜想二班学生本不想批斗我，也许是迫于压力，不得不走走过场。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嗣后，三十余年来，我同几位爱生问寒问暖不断。小孙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在东京工作；另一位去加拿大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在加定居。无论他们回国探亲或书信来往均称我为“父亲老师”（father teacher）。

把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放到各班去批斗，进行轮流疲劳轰炸，企图搞垮“敌人”的心理防线，同时壮大声势和煽动派性的仇恨，学校运动形成熊熊烈火。晚饭后，以伙房工人为主拼凑起的战斗队第一次亮相，后台指挥是军宣队的一位队员，听说是部队医生，他坐在打饭窗口前的椅子上，工人们围成一个圈，把我揪到圈子中央。伙房工人班的尚班长，成了临时拼凑队的头，他首先语无论次地吼着：“你反对我们工人，臭狗屎一堆，今天叫你尝尝串核桃的滋味”。说完后，抡拳猛击我胸部肋骨，我感到胸口上被一根铁棍捅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捂住胸口，倒退几步，冷不防身后工人的拳头又迎击我后背，我踉跄着倒向右边，右边的拳头又击打我的腰部，我佝偻了身子向左闪避，左边的拳头又到，我站在圈子中央不动，尚班长把中指突出的铁拳，专门找我的脊椎骨，腰肋骨捣、捅和，痛得我蹲下身子，将两手臂搂住两个膝盖，头伸入两腿间，真有点像核桃。尚班长一时无用武之地，他火冒三丈，挥起满是老茧的手掌，狠命地砍我的颈椎骨，顿时全身一阵麻木，侧身躺在地面。尚班长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班长，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被我俘虏后，释放回家，所以他有一套打人的本领，当时的形势使他有了重新施展淫威的机会。他不断地拳打脚踢，为了躲闪对方的拳脚，我蜷曲着身子在地上团团滚动，的确是一个人肉核桃，任人又捶又砸，身子终于动不了，幸亏其他好心的工人们只围在圈外观看，要不然我早已粉身碎骨，一命呜呼了。

当我苏醒的时候，已是暮色苍茫，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炊事班副班长李胖子师傅，从伙房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碗水，径直到我跟前，叹口气说：“刚才串核桃，我们是用拳推搡你，不要见怪啊！”我一面大口地喝水，一面感激地说：“胖子师傅，我明白，谢谢大伙手下留情！”尚班长因在文革中“革命”的表现很好，深得主子赏识，若干年后，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遭到支部党员否决，但他的申请还是被批准了，而成为正式中共党员。事后，大家愤愤不平，但谁又奈何得了他！

晚八点，军宣队在学校礼堂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在白天被斗得死去活来的我们六人，押到主席台上，两边各三人，低头弯腰，等候批判。军宣队队长谷政委终于正式亮相，从后台转到台前，主持会议，开始讲话。他讲话的内容和三月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誓师大会的如出一辙。他的话刚完，一阵打倒、砸烂、粉碎、消灭等语词的霹雳口号声此

起起伏，响彻云霄。第一个被拉出，接受批斗的是老校长卢老，他站在台前中间，我们五人站在两侧陪斗，这时上来几个造反积极分子和学生，要我们低头弯腰成九十度。我们年龄已是中老年人，又长期从事教书工作，常年坐着备课、写教案和批改作业，都患有轻重不等的颈椎、腰椎和脊椎骨职业病。患有这种病的人最怕弯腰，当我弯腰到九十度时，头颅里的血越聚越多，使得脸红脖子粗，头晕脑涨，呼吸困难，耳朵里几乎什么也听不清。时间长了我的身子越来越往下坠，想喘一口气，直一下身躯，立刻从旁边或台下有人窜到跟前，卡脖子砸脑袋，直听到‘砰’的一声响，有人栽倒地上，批斗中断。接着上来几个人，将栽倒的人提了起来，边臭骂，边手脚并举，待栽倒的人重新弯腰九十度，批斗又接着进行下去。我们六人被折磨得不是人形，其中女教师宫老的头发被撕掉大半，呻吟悲咽，蓬头垢面，惨不忍睹。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站在主席台上的教师代表是原“红教联”的头头，他看到我们弯腰，支撑不住时，走到我们跟前，抓住衣领，往上一提，口里喝道：“你还不老实！”他的举动使我们获得片刻直腰、喘息，聚积于头部的血液也随之往下流，就像干旱三年的土地迎来一阵及时雨。他提我衣领时，我看到他两眼向我示意的和蔼表情。薛老师是一位工人的儿子，是诚实的青年人，也是我们六人的恩人。那晚二个多小时的批斗，如果没有他及时援之以手，肯定会有人当场毙命。

最后在大会上被斗的人是我，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压轴戏。首先由王二头和李老师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似乎有过默契，都是把我历史上早已向组织交待过的社会关系中的同学、朋友，甚至仅有一面之识的人，说成是特务，暗示我是负有特殊使命，钻进革命内部的可疑人物，这样从历史到现行综合分析的效果，起码我是一个国民党特务嫌疑分子，然后号召大家大胆揭发我的一切“反革命”活动。

第一个被批准上台揭发的人是同我一块教高二年级的教数学的魏老师，他是刚分配到学校不久的青年，平时沉默寡言，为人厚道。他揭发我，在一次课余时间，我对几个学生讲  $1 + 1 = 2$ ，但在形式逻辑中，也可以等于零。魏老师揭发的都是事实，他上纲上线说：这是用资产阶级的诡辩术反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魏老师的话音刚落，台下有人高喊：“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紧接着一阵声讨的口号声。魏老师对我的揭发是有苦衷的，因为他有一个不好的社会关系，因形势所迫而为之，况且人们稍冷静思考一下，便会认识到  $1 + 1 = 0$  根本够不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也”。

原先我参加的群众组织，“东方红”的一把手上台揭发。她铁青着脸，指着我说：“不久前，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劝我说，对运动一开始就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李某某和私藏印章、阴谋反攻倒算的反动资本家邢某某，我们也应该同情他们。大家看看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狼子野心岂不是昭然若揭吗？！”

那位一把手姓杨，大家叫她“杨头”，她原本是军宣队和主流派老师们的主要对头，居然在大会上反戈一击。她揭发我“罪行”的事实完全是颠倒黑白，嫁祸于人，企图改变自己当时处于被动的局面。事实的真相是早在 1966 年学校工作组撤走后，学校无人主事，教师自愿成立造反派组织，人数多的组织是“红教联”，少数人是“东方红”。还有工作组主持学校运动时，被揪出来，仍囚禁在一间屋里的四位老师，既不敢回家，又不敢出来活动。我看见这情况，心里很同情他们，于是对组织的领导“杨头”建议：“东方红”应该帮助他们自己解放自己，鼓励他们出外看看形势。“杨头”当时接受我的建议，由我陪同下，她亲口向四位老师表达了：“东方红”的队友对他们处境的同情，支持他们自己解放自己。这四位老师欢天喜地回到家里，与家人团聚，不久，他们组织了自行车串联队，周游省内外各地，大开了眼界，回校后他们一直积极正确地介入运动，起到很好的作用。“杨头”把这一件完全是正义之举的事，打了一个时间差，说成是 1968 年的事。同情的对象原本是语文教研组长张老师，年青物理教师张老师，和与我同一教研组的小赵老师等，改成师生仍未谅解和放过的李、邢二位老师。后来我听人说：大会前她丈夫曾告诫她，要她冷静，不要乱咬人。“杨头”咬我这一口，燃起了那天



大会众人极大的怒火，批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首先有人喊：“把我校‘牛鬼蛇神’的总头目揪出来示众！”一刹那，口号声、跺脚声、敲打桌子和墙板的声音会合到一起，是汹汹的一曲交响乐，它的音量大大超过雄壮的“黄河大合唱”，而它的音调是人间最残暴恐怖的吼叫，同时我的肉体所受的折磨更令人苦不堪言。对那次批斗大会上“杨头”揭发我罪行的发言，我从未在任何交待材料中承认过，也未更正，并且未对任何人讲过。

批斗会终于结束了，我们被糟蹋得不像人样，直不起腰，挪不开步，就像几头使乏力的牲口，被人赶着，跌跌撞撞回到自个儿的窝，其中宫老师瘫软在地，是两个壮实的学生，把她拖走的。在回窝的路上，我隐约听到从身后礼堂里传出一个人的抗议声：“再这样搞人，我不参加了！”这一声如同严冬后的春雷，温暖了我破碎的心。至今我不知这位恩人是谁，但长期来我敬重、感激和钦佩他！

## 五、惨绝人寰的自杀之夜

学校大会批斗后，接连两天县造反派总部，红卫兵总部和我校造反派组织联合一起对各单位“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和开批斗大会。游街后，我们六人前后被揪到县教育系统大会和全县大会批斗。在县大礼堂举行的批斗大会上，批斗了四人，第一位是县委书记，第二位是县长，第三位是一中老校长，第四位便是在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教师。从卢老和我被安排到全县大会上批斗反映了当时第一中学（简称一中）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显示了一中造反派力量支配着运动的进程。揭发批判我的是王二头，他讲话时，常有点结巴又口齿不清，台下听众仅知道我犯有两条现行罪名：其一，我极力破坏革命大联合。台下的群众是县直各单位造反派的头头和积极分子，他们窃窃私语，因为都没有同我打过交道，怎么会破坏全县的大联合？！其二，我是同情反革命和反动分子的“牛鬼蛇神”总头目。全县批斗大会结束后，各单位造反派押着戴高帽、挂黑牌的“牛鬼蛇神”浩浩荡荡地打道回府。造反派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而我则心酸力竭，疲惫至极，也不想吃饭，坐在床上，感到活路渺茫。

晚上，政治教研组长刘老师领着五、六位老师来我宿舍，要我交待全部历史经历。刘老师是举止文雅的人，只命令我站着交待和回答质疑，他静心听，不时插话追问，迫使我回忆细节。如我交待刚上小学一年级时，参加过蒋介石在南昌召开的“新生活”运动大会。他便问我当时的会场讲台朝什么方向？主席台是什么建筑结构？蒋介石的衣着等等，我越想回忆往事，往事越是依稀，越想越乱，越乱越语无伦次，有时把国民党警察局说成公安局，刘老师并不恼火，笑着继续增加问题，我的脑子乱成一团糟，不知道我嘴里说什么，乱说八道起来。李老师负责查抄我的日记、手记、笔记、文稿、札记、教案、书信以及有我手迹的片纸只字，堆在桌上足足有一、二尺高。但造反派查抄我的文字材料中，不仅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罪证，反而证实了我对毛主席和共产党一片忠心。那夜，被抄走的属于我个人巨量的手稿至今仍未归还我手中，有人曾告诉我：我离开中学到大学工作后，他亲眼看到我的巨量手稿，仍在李老师家中。那些手稿对任何人都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了，但对我却是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李老师应该归还我的全部手稿，一个公民非法占有和私藏另一个公民的手稿、日记、笔记和信件达三十余年之久，是严重触犯法律的行为，如果李老师有悔改表现，立刻通过组织将查抄我的文字资料，尽快全部归还。

刘老师搞完攻心战之后，他们满载查抄的资料走了，时间临近深夜。我已心力交瘁，仍然木然地站着，几乎成了没有感觉的植物人。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从三楼上传下有人踩地板发出的噔、噔巨响，震慑了我的听觉神经，随后又听到一阵骂骂咧咧声。我猜想一定有人在囚禁李、邴二位教师的三层阁楼上开“小灶”，顿时我心惊肉跳，如惊弓之鸟。

我正处在惶恐之际，忽听见一双厚底皮鞋下楼梯的噔、噔声，我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我

还没有缓过气来，那皮鞋声一直响到我的房门外，我忙转身，想前去开门。‘砰’的一声响后，房门被撞开了，我只看见一只轮胎厚底和翻皮包头的军用棉皮鞋跨进门来，我没来得及看清闯入者的面目，我的胸口便被打了两拳，我倒退两步，摔倒床上，胸口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往外吐。来人拧住我的上衣，一把抓住我的衣领，用力将我的身子往上提，又狠狠地往下一蹬，口里骂道：“你还不老实！”我这才认清对方的嘴脸：猪肝色的脸膛，瞪圆的一双狼眼，咧开两片厚嘴唇，龇着两颗大门牙，面目狰狞可怕。这青年原是我所教的高中一班的学生，六五年入校时，是一个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学习努力，尊敬师长的好学生，深得老师称赞，同学拥护，第一学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推选为学习委员。谁知六六年中国社会风云突变，该年秋北京“联动”过境串联后，该生一反常态，他是全校中第一个动手打老师的红卫兵。因为恰好他的姓是“阎”，又打老师打出了名，所以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阎罗王”的绰号。

“阎罗王”进得门来压根儿不用嘴批斗，而是拳打脚踢的全武行，我的心口剧痛，两臂紧紧地交叉捂着胸部，身子东倒西歪，哆嗦异常。跟在“阎罗王”身后的两学生始终没有助战，这当口儿他们从我身后两旁插上，各用两手扶持我的肩膀，一个学生大声吆喝：“站好，老实站好！”一面附耳轻声说：“在三楼打得还凶。”说话的学生是一班团支部书记小范，另一个是班上一贯老实巴交的学生小王。“阎罗王”见两个队员手软心慈，更加怒火中烧，用鞋后跟狠命踩我的脚背，我的脚背骨像碎了似的，痛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阎罗王”一面厉声喊：“我叫你装死！”一面用皮鞋尖，踢我的脊梁骨，我感到脊梁骨中间断了，一头歪倒在地板上。“阎罗王”一脚踩住我的胯骨，恶狠狠地说：“叫你死，也别想翻身！”那二位学生把他拉出了房门，“阎罗王”仍大声喊：“明天晚上再收拾你！”不久，从教师宿舍楼外，传来小范嚷嚷声：“你再这样打人，我们不参加你的战斗队了！”倘若当时那二位学生像“阎罗王”一样揍我，当夜我便活不成了。我教的高中一、二班共九十多个学生，只出现一个打老师的“犹大”，全校近八百余学生也只有这么一个“狼人”，而这位打人王竟然是我们最喜欢过的三好学生。

“阎罗王”走后，已过子夜。我的全身骨架散了似的，胸口到咽头像堵塞了东西，想吐，吐不出，要咳嗽又不敢咳，一咳嗽便牵动胸肋骨痛，只好双腿蜷曲躺在地板上。突然我觉得喉头微微发痒，心跳加速，突然一股粘糊糊的液体冲出喉咙，我忙用双手捧住，一团鲜血呈现在眼前，我的心顿时凉透了。一阵一阵悲痛袭击我尚在跳动的心弦，在泪眼迷离前，我看到满地书刊报纸，顺手抓了一张报纸，擦去手里的血，爬到床沿，我想把一只手搭着床头，借手臂的力量将身子坐起来。忽然我的手触到一小捆绳索，我心头一紧，翻身坐起，下意识地两手将绳子搂在心口，我半昏迷中，看到妻子抱着女儿，两个幼儿牵着妻子衣服的两角，在朦胧中她和儿女们向我招手，在昏暗中听到她和儿女们的号啕声。当绳索自动地从我手中松落地上时，我方如梦初醒，回忆起在这惨绝人寰的世道中有四个亲人盼着我回家。我不能走那条路，我要回去。我反手撑住床边，艰难地施力，使身子坐到床上。我仍头晕脑涨，两眼看到对面白花花的墙壁，无路可通。窗玻璃外是黑魆的夜空，我仿佛看到前面黑沉沉的世界里阎王、判官、牛头马面和蓬头垢面、赤身裸体的众多小鬼，那是地狱，一旦进去便再无回头路。我昏昏沉沉站在生死十字路口，选择我该走哪条路。一个女人的凄惨叫声冲破万籁俱寂的夜，也惊醒了我的思路。我想到明天，等待我的明天是游街、批斗、逼供、怒骂、各种各样的侮辱折磨和肉体的摧残，尤其是要遭受那双又重又厚军用棉皮鞋的踢、踩和蹬。我从床上又坐回到地上，摸着了绳索，两眼四处张望，旧式教堂房屋里没有任何可挂绳子的房梁，只有在大窗扇上的铜把手留给了我。我爬到窗台，用手扶着台子，支撑身子起来，将绳拴在铜把手上，做好套。我翻转身，倚着窗台，将绳套套住脖子，身躯猛然向下沉，身子悬在半空中，两脚跟微微触及地面，想求生也已不可能了。我上吊后，开始尚能呼吸，随时间流逝，呼吸渐渐短促、停顿，脑胀，头肿，血在血管里往外鼓，眼珠似乎要夺眶而出，感觉全身异常难受，渐渐麻木，一闪念，想说：“我走了！”突然一股凉气从下而上直冲脑门，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的生命结束了。直到我苏醒过来，我发觉我躺在冰凉的地上。天已蒙蒙亮，我逐渐恢复了知觉，回头看着在窗把手上已断了绳索，才醒悟，死而后活了，我感觉不出是喜还是愁，只知道还得经受想象不到的折磨和痛

苦。

突然，在窗外有人大声喊：“有人跳楼了！”声音如晴天霹雷，震得我神魂颠倒，不相信自己的听觉，喃喃自语：“真的也有人自杀了吗？”外面又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喧哗声，我镇定下紊乱的心态，轻轻拧动窗扇把手，推开一扇窗户，露出一条窄缝，偷眼往窗外院子搜寻，左前方地上躺着两个人：一个身材瘦小，他的头破裂了，淌了一地脑浆；另一个身材高大，他直挺挺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有一位青年教师路过我窗前时，故意哈哈大笑说：“我以为死的是谁？他倒还活着！”这是有意说给我听的，他代表了一股要置我于死命的势力，他们要我走这条路。这时，军宣队谷政委和几个主事的人匆匆来到现场，我赶紧关上窗户，回到床边坐下，寻思学校死了人，运动能否减弱下去？

整个上午，学校里风平浪静。我暗想中央文革不收兵，运动一定会加剧开展下去，既然已从死路上回来了，暂时躲一下风头，或可九死一生。我找到一件旧棉背心，肩部缝线开裂，我将剩余的钱塞进棉絮里，重新缝好，贴身穿了两件衬衣，套上棉背心，罩上中山装外衣。下身穿了两条短裤头和长裤，脚上换上高腰球鞋。着名的《孙子兵法》上讲：“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决定要亲自检验一下这条高招的正确性，我坚信我决不是反革命，走到天涯海角，也不是反革命。

下午，果然不出所料，我们三个男囚犯被押到学校宿舍院的传达室对过的一间放杂物的储藏室集中看管。不久，自杀未遂的李老师被抬进临时囚室，他面如死灰，一只腿打上石膏，虽然活了下来，好端端的一条腿因此残废了。午后三点钟我们被押去南院批斗。出了宿舍院大门，街道两旁墙上贴满了大字标语，冷眼扫去，只见一条标语上写道：郝某某以死向毛主席无产阶级疯狂反扑，罪该万死！另一条大概是：我们造反派和革命小将决不向阶级敌人投降！以上两条标语内容反映了军宣队和造反派不会因有人自杀而手软，批斗将会更残酷。参加批斗大会的老师和学生显然比昨晚少多了，在批斗会上只有少数几个红了眼、横了心的造反派师生对我们咆哮和暴行有增无减，但他们心虚，没能加强整个批斗会的声势。时间不长，批斗会草草收场。我并不感到宽心，因为谷政委要听从上级的指挥，决不会承认运动搞得过火，一定要再积蓄力量，寻找或制造机会，重新燃起运动的熊熊烈火，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晚饭后的时间是少数极端分子施展暴戾的好时机，被批斗的人心惊肉跳，一个个在囚室里等待折磨。我们坐在自己铺位上，低头不语，愁容满面。我心里焦急万分，因为昨晚“阎罗王”留了话，我要在他收拾我之前，脱身自救。晚上十点多钟，囚室门外的监守是一些初中学生，人数增多到上百人。十四、五岁的孩子好动，有的打扑克，有的下棋，有的在大门外闲聊。我看时机来了，暗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向外喊：“我要拉肚子！”下着棋的一个男生大概是头目，他捂着鼻子，说：“臭！”说罢，他命令其他学生跟着。学生互相推委，都不愿去。那小头头火了，说：“都去！快去！”一下子去了八个，四男四女，他们跟在我后面向厕所走去。学校厕所是靠临街南墙修建的，靠墙修建了一个长一米多、高约四十公分的小便池。围墙高约一米八上下，墙上面拉了三根铁蒺藜。小便池后面有一排粪坑，我走到厕所门口，回过头说：“我拉屎去了！”学生都不愿意靠近，一个男生捏住鼻子，挥手说：“快拉你的！”我闪身进厕所，假意向里蹲茅房，侧耳听外面动静，小同学们早已嘻嘻哈哈、打闹起来。我毫不犹豫，一步跳到小便池的台阶上，左脚踏着便池沿，右手抓住一根支撑铁蒺藜插入墙上的铁棍，右脚尖踏着一处较宽的墙缝，左腿飞身上墙，右腿跨过三十公分高的铁蒺藜，踏着墙头，左腿紧急随后跨过，翻身跳下，双脚落地。整个动作前后不到半分钟，真是“狗急跳墙”。我向西窜到对面学校南院北围墙根，顺墙有一道约四十公分深的水沟，我跳入水沟，猫腰向东疾步，约莫走了十余步，听见学生高喊：“跑了人啦！”我看到不远处的水沟旁边长着一丛杂草，顾不得脏，钻进草丛下，趴在水沟里。不久，从南院里跑出一大群学生，大多数向西跑，少数往东跑，有的学生边跑边喊：“他跑不远，快追！”折腾了半夜的学生们，三三两两地无功而返，子夜的寒气逼人，无论

“不可沾名学霸王”的造反派和小将们具有何等的顽强，终因体力疲惫不堪，放弃了“追穷寇”的决心，而入梦乡了。

夜深人静，我探出半个身子想看看周边的动静，忽然听到从学校南墙根传来趿拉着鞋的脚步声，我机警地蹲下，脚步走到水沟前停住了，有个轻轻的沙哑嗓音：“小子，我早瞅见你了。”我辨认出是宿舍院看大门的刘大爷，觉得他并非有什么恶意，站了起来。刘大爷轻声说：“蹲下”。我又蹲下，刘大爷接着也蹲在沟边，轻声说：“谷麻子下了死命令，若逮住了你，先打断你的腿，出了事他负责。唉，跟我走！”我急忙跳出沟，拔腿就想跑。他拉着我，附耳说：“听我的。”说罢，将他身上的一件棉袄，披到我肩上，用一条头巾包住我的头，搀扶我向东走去。一边走一边轻声告诫，遇到人，装病哼哼叫。走了约半里地，便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向北不远是铁路小道。刘大爷说：“小子，往东走。他们派专人连夜向西追赶你去了，说你老婆住在西边。”我将头巾和棉袄取下，朝刘大爷磕了三个响头。刘大爷呜咽说：“孩啊，快跑，逃得越远越好。”我转身往东跑，小道两旁的麦子长得比人的腿还高了，我钻进麦地里，松了一口气，伸出头往回望，仍可看见一个干瘦佝偻老人的背影，缓慢地走远了。我一边流着感激的泪水，一边双膝跪地，连连磕头无数。我看到后无追兵，放心地站起身子，沿铁路旁小道往东走去，从此我的逃亡流浪生活开始了。

说起我的大恩人刘大爷，老人幼年时，家里很穷，十四岁下关东，靠打短工生活，二十岁下矿挖煤，回乡时已是四十几岁的人，便到学校找到一个勤杂工的活，后来年纪大了，学校领导照顾他看大门，娶了个胖女人为伴，两人没有子女，靠老人工资养活两口人，日子过得较紧。那时茶叶要凭票供应，老人也爱饮茶，所以我每月送他二三两茶叶，他按时给我灌好暖壶，我们间建立了友谊。因为他是贫农出身的老工人，造反派、红卫兵谁也不敢惹他，他要骂谁就骂谁。七三年地区师专要设立英语专业，我调到地区所在市，与家人团聚。当时刘大爷早已退休，曾同妻子商议将老人接来供养，以报昔日之恩。终因住房无法解决，未能如愿。当七十年代末，我的住房面积有了较大改善时，刘大爷已被他的侄儿接回原籍农村，学校每月寄去的养老金，均被侄儿占有，最终老人被虐待而死。每想到自杀之夜老人相救的情景，落泪不至。至今我仍不知道老人的名字，也未打听到他身葬何处，虽然老人从未想到要我报恩，但我心中总有一种负疚之感。

## 六、逃亡途中，生与死的反复较量

自杀那夜，我担心被逮住，如丧家之犬，沿铁路旁小道跑跑走走，滚滚爬爬，终于看到前面有一个小车站，正停着一列东去的货车。我沿列车向前走，忽然举目看到一个车厢里装着东北板材，我也实在走不动了，不顾违犯铁路规章，爬上车厢，挪开长长的木板，将身子挤进木板间的空隙，躺下不动，不久听到车轮滚动的声音。我嘘了一口长气，宽心地闭上眼睛。过度紧张的精神松弛了一会儿，满身伤痛的感觉逐渐恢复了，同时夹着身子的木板左右晃动，胸的两侧肋骨不时受到碰撞，钻心刺骨的疼痛令人难熬，不得不爬起，另找安身之处，爬到车厢前和右挡板连结处，发现一个空隙，先将两脚下伸，触到车厢底，正好容纳我的身躯，在摇摇晃晃颠簸中站着迷糊睡了。一阵猛烈的震动使我惊醒，一时懵懵懂懂，我不知为什么藏在车厢木板堆里。一阵尖锐刺耳的汽笛声，震醒了我的神经，我想起昨夜一场生死浩劫。幸亏货车车厢停在卸货站台，还没来工人卸货。我爬出木板堆，顺当下了车，横过几道铁轨，从车站栏干的残破缺口处走出了站，我找到候车室，才知道我逃到了烟台。

我如惊弓之鸟，在候车室我找到一处旅客拥挤的角落，蹲下身子，机警地环视候车室里人员的情况，没有看到学校造反派教师和红卫兵的身影。我裂开棉背心上的肩头缝线，取出钱，放进中山装口袋里，胆怯地走出车站。我发现沿街卖干粮的小商小贩处处可见，人群中东北口音的人很多，有的扛着、夹着或捧着装满馒头、烧饼和挂面的编织袋子，也有的拿着大大小小

的空袋子，寻找卖干粮的商贩，市容有一点繁荣的景象。我从耳闻目睹中了解到买干粮的人都是从大连来的，他们乘一夜船，船靠岸后，便急忙上街抢购干粮，当晚乘船返回，一个来回除了船票，能赚十块、八块。我便跟着买了干粮的人群，走到海港码头，花三元钱买了当晚开大连的五等船票。在烟台港我东逛西游，混到傍晚，上了海轮，就此走远了。

我登上海轮，五等票在船舱底部，便顺着楼梯往下走，原来五等舱是没有床位的大统舱，一色地铺，自个儿找地方睡，许多人已铺好毯子、席子或床单，占据了铺位，我什么也没有，正在东张西望时，一位老大娘背了一个大包袱，一手拎着一个鼓得满满的大布袋子，另只手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也正在找空子占铺位。我主动向前说：“大娘，我帮你！”说罢，我取下她背上包袱，抢先几步将包袱放到靠船舷的空位上，又将自己的挎包并排放好，接着脱下外衣，也扔到地上，占了三个人的位置。大娘后脚赶到，连声道谢，大娘打开包袱，取出一条旧线毯，我帮老人铺好毯子。那大娘又取出一条薄棉被，将剩下的衣物包好，当枕头使。老人回头，看到我坐在地上，奇怪问：“大哥，你的铺位呢？”我有点忸怩说：“大娘，我急着赶船，没带被褥，坐一夜，也就到了。”大娘热情地说：“那怎么行，大哥若不嫌弃，挨着孩子，挤一宿。”说罢，那大娘将当枕头使用的包袱，往旁边挪了一挪。我千谢万谢，大娘说：“大哥，别谢了。你帮了我，我岂能绝情！都是出门的人，为人方便，也是为自个儿方便嘛！”我整整两天一宿没睡过安稳觉，躺下后，触到身下的船舱铁板，脊背硌得疼痛极了，只好蜷曲着睡觉，但一闭眼，似乎看到妻子遭一伙人围攻逼问，两个幼儿吓得哭，小女儿惊得不住啼，妻子披头散发向他们要人。一阵思念，一阵泪水，一阵无穷无尽的牵肠挂肚的话，半醒半睡，昏昏沉沉，辗转难眠。次日清晨，轮船抵大连港码头，我帮大娘扛了大包袱，抱着小女孩，上了岸，又将祖孙俩送到汽车站。大娘千恩万谢，低声说：“大哥，你是好人。别太伤心难过，往远处想啊！”我的脸顿时红了，大娘已看破我的行迹，一时不便回话，只能点头示意。大娘和我虽相处一夜，但大娘慈母般的关照和话语，温暖着我的心，可惜，依依告别时，忘了问大娘姓氏，现在她老人家恐怕早已寿终正寝了，今生的恩有待来世报！

大连确是空气新鲜、景色宜人，街道干净，建筑优美的城市，既然身离火坑甚远，暂且放心到处走走，也好观察当地运动的状况。在一条宽阔马路上，有一幢大楼被毁，听说那座大楼原是一个大百货商场，数日前两派在里面武斗，又烧又砸，将大楼彻底报销了。我从窗口向倒塌的大楼里面看，几层楼楼板全部陷落，仰头可直望天空。虽然我看到一幢好端端的大楼没有在战争年代毁于炮火，而毁于不该发生的人为内乱，感慨不已，连同眼前我自身岌岌可危的处境，重重地压在心头。我边走边思考，继续逃亡还是回校请罪？若我回校，谁能保证那个要打断我腿的谷政委会放过了我？退一步想，那种无休无止的折磨，活着不如狗，死了还要斗，逝者如斯夫，亲人痛无边的苦日子，何时才能熬到头啊！走，掉头往南走，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第三天头午，我终于熬到了上船的机遇，到了三等舱，对照我的船票号码，找到一张双人床的上铺是我的床位，我爬上床，倒头便睡。醒来时，已是次日下午，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有余。我看到有旅客拿着毛巾、肥皂去洗澡，便爬下床，拿了毛巾和缸子去浴室。浴室是狭长的，右边是靠船舱一排用隔板隔开的六个淋浴间，尽头一间空着，我从窄小的过道，侧身到了浴室，脱光衣服后，我方发现全身上下皮肤布满了青色的伤痕，从脚脖子到大腿肿得像馒头，我将食指掐腿肚子，留下一个深深的窝。淋浴完后，我已是疲乏不堪，走回船舱，从铺位上的挎包里，取出在烟台买的大饼，嚼了几口，爬回床位，便昏迷不醒。不知道过了多久，醒转过来，船舱已空无一人，出得舱门，船员水手们正忙着冲刷甲板，趁没人注意，我悄悄离船上岸，到达了上海。

五四年年我从朝鲜回国后，上级照顾我回家探亲，来回路过上海两次，所以对那一带的情况较熟悉。走出了十六铺长街，空旷的外滩尽收眼底，我沿着长长的黄浦江防浪石墙向前漫漫走去，大约走了一里来地，见有供游客休息的两人坐木条靠椅，我住脚坐下，将右腿架在左膝

上，用手轻轻地揉搓浮肿的腿肚，一面无目的地眺望闪着星星的夜空。不久，我坐累了，便把我的双腿放到座位上，右上臂倚着椅背，将头枕着右臂休息。不一会，我睡得迷迷糊糊，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我坐的长椅前过去，不久又听到返回沙沙响的脚步声。究竟我有当过几年兵的作战经验，判断来者可能不怀好意，我睁开一只眼窥视，看清手挽着手的一对情侣正窃窃私语，他俩再轻轻掠过时，我发现四双男人的大脚，我当机立断，背上挎包，两脚一落地，转身撒腿向大马路疾走。两人撕下假面具，紧跟后面追赶。我斜着向马路对过灯光明亮，大门口站着两个解放军的上海市某机关大楼跑去。我气吁吁地到达人行道时，回头望见那两人在马路对面停住了脚，我长舒了一口气，暗自庆幸又逃过一次劫难，否则那两个暴徒抢走钱物，将人往黄浦江一抛，人不知，鬼不觉。那我的尸体可能冲入大海，从此无影无踪，也可能浮出江面，成了无人认领的溺水身亡的死尸。这两种结果都不如死在原工作单位，因为死在原单位，组织上决不会写上：叛国逃亡海外或叛国投敌的罪名，给我的妻儿子女留下沉重的政治包袱。我拖了全然麻木的两条腿，返回十六里铺的方向走去。我走到金陵路口，看到马路对面有一段骑楼的人行道，近前一看一处大门旁边挂着“长江管理局售票处”的牌子，门外三四个乞丐倚墙一溜儿躺着，私下自忖，今夜暂且在此安身。我从挎包取出塑料布，挨了乞丐在地上铺好床位，便倒下身子睡觉。

天亮前，路口寒气逼人。我起身，悄悄地离开熟睡中的难友，盲目地挪步漫游，猛抬头，看到又回到了十六里铺，前面不远是面食店，店铺已开张营业。跨步便进了店，一个伙计笑吟吟说：“客人早啊，头一锅牛肉汤，来碗牛肉面？”我也显得轻松自在，说道：“就来一碗牛肉面。”伙计说着“来啦，一碗牛肉面”，接着从锅台上端上一碗香气扑鼻、热腾腾的面条。眼前的那碗牛肉面馋得我流口水，端起碗，一口气将面条填入肚里，咂了一口原汁原味的牛肉汤，其滋味胜过山珍海味和鱼翅熊掌，还有半碗面汤，舍不得享用太快，又要了一碗阳春面，将面汤倒入面条碗内，用筷子搅动几下，一会儿又填进肚皮，看到碗底和四周留下隐约可见的油迹和汤沫，又要了半碗面汤，涮了涮碗，两三口将面汤水灌入胃里。这时感到从丹田散发出一股热气，不住地在体内旋转，舒坦极了，似乎有点得意忘形，雄赳赳跨出了店铺门槛。

我掉头返回到金陵路口的长江管理局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三天去汉口的定期班轮三等舱客票。我得在上海呆两天两夜，白天的日子还好打发，两夜的住宿就难熬了。上半夜我像夜游神似的到处寻找可避风栖身的墙根屋角，总得到下半夜，我又回到金陵路口骑楼下，才有一席栖身之地。我在上海金陵路露宿三夜，也曾同几位穷途潦倒的朋友交谈，其中一位是安徽农民，因连年水灾和虫害，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街头。俗话说：“不可以貌取人”，在上海与我同眠街头的人，虽然他们衣着褴褛，大多因生活困苦，沦为乞丐，而且从未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横行霸道，并非奸诈邪恶之徒。

第三天上午，我终于登上了江轮，三等客舱是有两长排上下床的大统舱。我持的票是一个大统舱门口的下铺，上铺是一位带着一大包搪瓷的老工人师傅。那位老师傅待人很热情，不大会儿，我们蛮说得来。午睡后，老师傅约我一同去淋浴。江轮上的浴室比海轮上的宽敞多了，外面还有盥洗间。淋浴完后，我回铺位，从挎包里取出上次在海轮上换下的衣裤，上小卖部买了一块洗衣皂，去盥洗间洗衣服，其实我身上穿的也够脏的，干脆我将里面的衬衣裤都脱下来，一块洗干净，或许由于身体衰弱和较长时间的劳累，顿觉胸口疼痛，咳嗽不止，越咳越喘，越喘越咳，忽然一大口鲜血从口中喷出，飞溅四处。我两脚一软，几乎昏厥倒地。有人从后面抱住我身子，我仰望，依稀认出是住我上铺的老师傅，我有气无力说：“我——血——衣服——”，老师傅低声说：“听话，先回床位躺下，这儿的事有我。”他半搀着半抱着我，回到铺位，安置我躺下，用毛巾擦净我的两嘴唇边的血，又取开水将毛巾沾湿，敷在我额头上，俯身附耳说：“什么也别想，安心睡好。”

我迷迷糊糊的时候，从船尾方向有人喊叫：“有人跳水了！”接着，一阵嘈杂的呼喊声此起

彼落，我心里明白，船上有人跳江自杀了。我挣扎着想起来，但身子似有千万斤重，丝毫未动。我叹了一口气，合上眼皮慢慢地睡了。第二天，天已放亮。在睡眠惺松下，我看到床的两根柱子间系好的绳子上，晾着我的衣裤。我如梦初醒，昨日下午在盥洗间的事，一一涌现在心头。我探出上身张望时，老师傅一手端着一碗粥，一手拿了一个开花馒头，他对我说：“醒了！我把早餐给你带来，就坐在床上吃吧！”我这才发现我的身上盖着一条毯子，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忙说：“老师傅，叫我怎样报答您！”老师傅笑而不答，把碗和馒头放到我手中，坐在床沿，用手一一抚摸晾在绳子上的衣裤。也许吐出了淤血，我感到全身轻快多了，对待眼前如此热心救助他人的老人，我应该怎样向他道谢？我心乱如麻，口里念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喝粥和吃馒头时，听到船舱里三五成群的旅客唧唧喳喳谈论什么事。有一个旅客声音高些，我听到他说：“人好好活着，跳江干吗？我们那儿抹脖子的、上吊的、五花八门的，啥子世道嘛！”我也不喝，不吃了，我的两眼呆滞无神地看着前面，直到老师傅把我的饭碗取走，我方省悟，歉意说：“师傅，我饱了。”老师傅自言自语，又好像故意说给我听：“我们厂的总工程师撒手走了嘛！八十岁的老娘哭瞎了眼，老婆疯了，儿子跑了！他要想回来，回不了了。”老师傅的话增加了我对家人的担忧和思念：小女儿已满月了；若无意外，妻子可下地干点家务了；两个幼儿辛苦了大半个月，点燃炉子，切菜，烧水时有没有伤着手？挑水时有没有闪了腰？那几个魔头会放过我的亲人们吗？她和孩子们没有钱了，日子怎么过下去？数不清的挂心事，愁肠百结，思绪万千。老师傅说得对，我走了，虽然一了百了，但再回头看望妻儿子女，已没有回天的力量了！

三天两夜在长江轮船上的逃亡生涯，我的伤感情绪有点减轻，身体上的斑斑伤痕也变得淡黄了，我和老师傅的友谊发展到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地步。他给了我一些朴素简单的人生哲理，其中有关于如何看“文革”的观点，对我启发最深。他说：“共产党不会让天，老这么黑下去！想要翻天的，就那么几个人嘛，他们不代表共产党。”他又说：“别想你那个功、这个模，同刘少奇咋比？人家一座山，一炮也就打掉了嘛！你是一撮泥土，怕啥？！泥土不怕踩，你踩它，它越结实。啥子炮，啥子脚，都会烂掉的！留下来的是泥土嘛！啥子万岁，泥土真万岁。”我明白老师傅讲的泥土就是人民，他开导我，要我别自暴自弃，要有泥土的质地，经得起挫折，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哩！

那天清晨，轮船抵达汉口码头，我同老师傅在离码头不远的的一个马路十字路口分手，我当着众多行人的面向老师傅恭恭敬敬地鞠躬致敬，他笑说：“不要来你们那套酸气！要争气，要志气！”我久久望着老师傅背着叮当发响的一大包搪瓷用具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之中。他那热心和乐观的精神使我终身铭记不忘。老师傅又始终不肯告诉我他的姓名，他总是以顺口溜方式回答：“天南海北，人来人往，你东我西，各自活忙，啥名啥姓，别记心上。”事隔三十余年，老师傅若健在，或可将最后两句改成：“无名无姓，永生难忘”。

我按照预定的路线须要从汉口转乘火车南下，无心游览汉口市容，不久找到了火车站。火车站外面附近的吃食店很多，各店食客几乎满座，从一个较大饭馆门口向里张望，划拳干杯、高谈阔论、打趣斗嘴、南腔北调、总之热闹非凡。我多年来没见过这样活气场面，似乎“文革”斗争之风已烟消云散，不由自主地挤进食客排队的行列，趁机或许能听到一些有用的消息。一个醉汉说：“你咋坐车还买票！？咱儿红卫兵能，咱老子坐车也从没花钱。”另一个食客也醉得够呛，眯缝着眼说：“咋坐？”那个醉汉的舌头已不听使唤，还喋喋不休说：“咋——买站票——上车——谁——管——？”另一桌，有人悄声说：“上面来了文，要煞住自杀潮。那么多人不想活了，日后咋向历史交待嘛！”我竖起耳朵想听下去，但是说话人声音放低，周围人声嘈杂，再没听到什么，有一点可信，上面可能暂时要把运动放缓一下。

我计算一下我口袋里的钱，除去回程路费和生活费外，所剩的钱要支付回乡的车旅费十分

拮据，决定采纳饭馆里食客谈的坐车少花钱的秘诀。我买了一张短程火车票，上了从汉口直达长沙的客车，果真途中无人来查票，顺顺当当到达长沙。我本来应该不出站，等候下趟快车，继续南行。因久闻长沙的名胜古迹，特别毛主席青年时期就读的长沙第一师范，我仰慕至极，有此难得的机遇，不可错过。我游览了湘江岸美景，眺望了橘子洲头水波涟漪，白鹭飞翔，《岳麓书院》的廊、亭、斋、径古朴而幽静。第二天上午怀着无限敬仰之情找到《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可能仍保留原貌，是临街一座红砖建筑平房，大门只开了一半，不敢冒失进去，在附近张望一会儿，不见有人进出。

我在长沙火车站买了去广东韶关的车票，抵达韶关，露宿一夜，次日清晨改乘汽车，当日下午五时许，我回到了我的故里，结束了为时半月有余的风餐露宿逃亡生涯。

## 七、故乡风物、故乡山水、故乡乡亲

下午临近黄昏，我回到我的故乡——赣州。我家在赣州城关西津路上较偏僻的田螺岭小巷，我进了大门看到我家南窗户亮着灯，我知道婶母在家，婶母见着我，惊问：“你怎么回来了？因公？”我不敢将实情相告，含糊搪塞说：“路过，想回家看看。”婶母实际上是我十二岁那年母亲改嫁后，哺养我的养母。她原是北京科学院的干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赶回老家的，所以一看到我狼狈样子，她的心中已明白几分，她轻声说：“你若无事，我就向居委会打个招呼。”我家对面房就住着居民小组长，婶母去了一会儿，她同小组长来到房门口，原来是解放前的老住户陈嫂，她也可说是看着我长大的，她十分亲热地说：“你十几年也不回来看看家，今天兵荒马乱反而回窝了，在家多住几天。”爽快地对婶母说：“大学生回来了，住不了几天不用报户口，明天我对居委会主任说去！”陈嫂是一个家庭妇女，不识字，是大院内出名泼辣爽快的女人。她还是老样子，对我的突然回家丝毫不怀疑，大包大揽，敢说敢做，使我分外感激，觉得自己又是个人了。

天蒙蒙亮，我去了后院。后院有一个半人高的小山坡，在西北山墙角桃树后面山墙有一个缺口，我跨过缺口，爬上三五丈远的陡坡，便是田螺岭的山头，山头上建造了一座数层的木结构高塔，南宋著名诗人辛弃疾，在此写了一篇充满爱国悲愤的诗，第一句是：“郁孤台下青江水”。这座多角形木塔就是“郁孤台”。我看到两个儿童欢蹦乱跳，天真烂漫的形象，不由想起我那两个幼儿。他们纯真无邪的幼小心灵由于受到政治上压力的影响变得老成、严谨和悲哀，他们从懂事起就极少欢快地跳呀、唱呀，享受人生中最宝贵的金色童年生活，为人之父的我怎不凄然潸潸泪下。我正哀思，听到有人远远唤我，我回头望我家后墙，看见白发苍苍的婶母向我招手，示意回家吃饭。我在饭桌上一面用膳，一面落泪，婶母叹口气说：“你要流泪的话，我的泪比你多。你从小是倔强的孩子，大了反而软弱了。天塌下来，也要站着死！”婶母的一番话激发了我的勇气，使我以后逐渐坚强起来，任凭风吹浪打，我要做到巍然不动。婶母的大半生就是做人的鲜明榜样，“文革”初期，婶母受到严重冲击，她从不怨天尤人，她相信自己的信念，也相信共产党，直到七十年代末，她直接上书中科院院长胡耀邦，终于得到平反。人就得有这种韧劲和骨气。

我身上的伤还没好，筋骨常常隐隐作痛，同时体质异常虚弱，急需治疗和补充营养。营养较容易办到，治疗得冒暴露的危险。我想来想去只有找冯伯伯最安全，但不知他的情况。次日下午下班前，我去了中山公园附近的红十字医院，我向传达室一位老人问：“请问冯院长在吗？”老人左右看看没人，悄声儿说：“冯老日子不好过，晚上去他家找。”我走到离冯伯家不远的一处砖墙垛子后面，注视着来往人的身影，开始下班的人较多，七点以后，行人已是寥若晨星了。忽然我看到马路对过有一个高大的身影，他斜着向马路这边走来，我从昏暗街灯下认出就是冯伯。他就要跨进家门时，我抢前几步，悄声唤：“冯伯伯！”他停住脚，近前上下打量我，惊问：“你是谁？”相隔整整二十年了，冯伯自然一点也认不出我来。因冯伯早年是我父亲和堂兄的



至交，他家的老二又是我同窗好友，我用最简洁的语言自我介绍：“我是及愚的大儿，发英哥的堂弟，冯伯，想起了？”他听后又惊又喜，低声说：“你是十经子，打哪来？有事？”我说：“别的事不说，侄儿找你治伤，我的脊骨怕是折了。”他怒说：“那些混蛋打的！”我点点头。他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门，摸着黑走过过道，轻轻推开他住的房门，拉我进屋，立刻把房门闭了，拴上门插，开了灯，让我坐在床上，用手上下按摩我的椎骨，不住问：“痛不痛？”他摸到椎骨中间部位，我轻呼：“痛！”他在我喊痛的部位来回推拿，我扭转脖子看到在他苍老皱纹满布的脸上，冒出许多汗珠子，我低声劝说：“冯伯伯，停会儿。”他摇摇头，继续加力，只听见我椎骨盘之间发出轻微“咔”地一声，我痛得倒在床上。冯伯嘘了一口气，轻声说：“你的椎骨盘错位了，因时间过长，很难完全复位，就看自然的造化了。”他扶我坐起，觉得全身舒坦些，我“谢”字未出口，他写了几个字在一张纸条上，对我说：“你找这个人要跌打膏药，贴完三张或许能好，也可防止再损伤。”我想对冯伯伯讲清我的事，他摆手，苦着脸说：“大侄子，你不用说了，我完全明白。我的日子不比你的好过，各自听天由命罢！”他送我到大门口，附耳说：“今晚的事只有你我才知道！”我含着感激的泪水，呜咽说：“冯伯伯，你放心！来世侄儿报您的恩了！”

当晚，我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一个驼背老人，我说明来意后，他没说话，返身回到破屋拿出三张膏药给我，像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一——张——两——天。”说罢，他转身要进屋。我忙问：“老伯，该多少钱？”老人头也不回，反手将门关上。我看到老人住屋矮小破旧，实在不愿意无缘无故受人之惠。我用手指轻轻扣门，一面轻声说：“老伯，你不收钱，我实在过意不去。”我在门外磨蹭老大会儿，屋内没有一点动静。邻屋冷不丁开半扇门，伸出一个白发飘零的老婆婆说：“王驼子不收你的钱，你就不要再缠磨了，他就是那个牛脾气！”说完，随手关上屋门。我对屋门鞠躬三次，低头祈祷，喃喃自语：“祈望王老伯一生平安！”那三帖膏药定是祖传或民间专治跌打损伤的偏方，我按时贴换膏药，到第六天，我的脊骨损伤有了明显的好转，我怕事发，晚饭时，我对婶母说：“我明天准备买票，后天走了。”婶母说：“还是早回去好！”

次日一早，我去汽车站买票。万万没有想到祸起萧墙如此神速，我从汽车站回家不久，四、五个人来家找我，一个四十多岁“地保”模样的人，态度生硬地问我：“你是谁？”我照实回答。那人冷冷地说：“把你的东西带上，跟我走！”我知东窗事发，收拾好东西，十分羞惭和求谅解的语气对婶母说：“婶，侄儿实在对不起您！”我掉头跟“地保”走了。我跨出大门，听到陈嫂的声音：“刘主任，我家对孩子的孩子，一直是学生，参军后，民政局还送过喜报，是不是搞错了？”那“地保”带我去派出所，他拿出一张十六开的油印传单模样的东西，对军代表说：“军代表，该犯是不是先下大牢？”我在桌上看到纸上印着“通缉反革命要犯”的大字标题。军代表有三十多岁的年纪，大约是个连、营级干部，他反复看了几遍后，对“地保”说：“这通缉令中犯罪事实空洞，派性语气很重，又是单位革委会发的通缉令。若下大狱，要记录在档案中，错了，不好办。”他想了一会儿说：“我看送去三打指挥部暂押管，通知他的单位来人处理。”我感到军代表有水平，临走时，我右脚向左脚猛靠拢，向军代表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以示感激之情。他有点意外，向我点头回礼，温和地说：“那是群众组织，你在那儿不记档案的，走吧！”“地保”和两位随从将我押送到一个大宅院，我认得那座宅子原是我高中时一位同班又同宿舍三年之久的同学之家，当时已成了《三打指挥部》的办公地点和关押犯人的临时牢房。“地保”将通缉令和我交给一个刘管事，又轻声转达了军代表的意见，临离开时，态度十分生硬，气势汹汹对我说：“老实在这里呆着！”

刘管事细高个子，面貌清秀，他对一个管教人员说：“暂押二号室。”我进了二号室，原是临街的一间大卧室，里面有十几个犯人，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上，靠东的板壁前，安放了一张床，是用半扇门当床板，一个满脸胡子拉碴的五十来岁的猥琐老头坐在铺位上。那队员一出房门口，就有五、六个人围上来问：“你犯了什么罪？”我不大愿同那伙人交谈，冷淡说：“不知道，我是暂时存押的。”我没有被褥，不知何处安身，那个坐在床上的老头，挨到我身旁说：“你出三元钱，我把床让给你。”我有点喜出望外，给了他三元钱，他接过钱，我看到一双邪恶的眼睛盯

住我放钱的中山装上衣口袋，我心头一紧，暗自忖：“得提防这老家伙。”

一会儿，二室犯人的管教叫我去问话，我走到二进大厅，厅中间放了一张长会议桌，刘管事坐在上方，围桌坐了七、八个管教等人。刘管事叫我坐在他左手的空椅子上。问我：“你在单位得罪了人？”我原原本本把情况作了交待。一个人问：“你反对杨德志司令员？”我回答否，又问：“你反对王效禹？”我也摇头，那青年脱口说：“那他们凭什么抓你！”众管教七嘴八舌小声议论了一会儿，最后刘管事说：“你是派出所委托我们暂时看管，没有多余房间安排你，暂住二室，你虽不是我们的犯人，但要遵守这里的规章，你回去罢！”

我刚刚回到二室，坐在床上，二室管教身后就到，一屁股坐在我床上，像朋友似的问东问西。他好奇问：“你在朝鲜当过志愿军英语翻译？亲自审问过美国鬼子？”我如实回答他的提问，他喜冲冲走了，没三分钟，他手里拿着一本英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对我说：“你选一篇。”接着外面进来七、八个年青管教人员来听我念英语。我接过敞开书页的毛主席语录中的《愚公移山》篇，我流利地念完后，二室管教轻轻拍我的肩膀说：“有你的，这本语录就是你的了。”我欣然收下书，又试探着对他说：“我没被褥，能否麻烦你替我上街买一个单人床的草席和一卷手纸。”他点头出去了，不一会儿，他拿着一床草席和一卷手纸，说：“两元八角钱。”我给了他三元钱，他找回两毛。他又轻声对我说：“还有什么事？”我看这青年不坏，便请求将我的情况转告我婶母，劝她不要挂记，他答允，走了。

管教走后，二室犯人都围住我说：“管教那样看得起你，你有什么关系？”我摇头，又有人问我，家住城里哪儿，或问你过去在这里哪个学校上的学等问题，我也不敢得罪这些人，平和地说：“三两天有人来押我回单位，我的事最好不牵扯你们，请谅。”众犯人听了我的话，相信我犯了大案，一个个先后回自己的铺位，只有那个老头犯人，走近轻声说：“你的案子也不小，我是挑一担茶叶偷偷去香港卖，被捉住的。成功一次，好大赚头。”晚九点，规定熄灯睡觉。我担心学校派人押解我归案，谷政委会打断我的腿，忧心重重，久久未入睡。我正思绪如麻之际，忽觉得有人极轻微地在爬动，我假装熟睡，严阵以待。有一个人轻手轻脚地爬到我床头，站起身子，极轻微附耳说：“借火。”见我无反应，两根手指轻而易举地伸向我的上衣装钱口袋，我轻声对来人说：“我的钱已转移了！”来人弯腰伏地，爬回到了他的铺位，我认出来人就是那个老头。

第二天早饭后，地铺上一个四十多岁人的眼睛不时瞅着我，我有点纳闷。那人高兴地走到我近前，笑问：“你家是不是住田螺岭一号？”我吃惊地回答：“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那人说：“我和你们大院内的南贵是朋友，常去他家。解放前在你家院子里，见过你几次面，你那时还在读书。”我问他：“你怎么进来的？”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乡下亲戚家有一头不能耕地的老牛，托人进城之便，找我帮他家宰牛，这事已报告大队了。三打的时候，各街道要凑足摊派任务的犯人数，我便进来了。”我没吱声，他哭丧着脸说：“有理也说不清。”我虽不了解事情真像，但看那人一副老实巴交相，产生了同情之感。我安慰了他一番，此后他总关照我，买饭、喝水和打扫卫生等琐事，也算是一场意外相遇的朋友。一直到七六年我已调到大学当英语教师，去北京出差，顺便拜见在北京等候解决落实政策的婶母，闲谈中，婶母说起我在六八年一同被关在三打指挥部的那人。他去找他的朋友南贵时，顺路特意看望了我婶母，告诉她，我在三打指挥部时，当时的管事和管教对我都很好，看来回单位不会有什么大事。人类社会极其复杂，一时的朋友常常比相交几年、十几年、甚至时间更长的朋友还更友情。

在三打指挥部我被扣押的第四天下午，二室管教悄悄告诉我，学校已派来三个人押我回去，并说刘管事听了领头人对我“罪行”的介绍，不以为然。晚饭后约八点钟左右，管教叫我去，我看到王三头带领一个姓张的校工和伙房新来不久的炊事员小田，王三头一见我，龇牙咧嘴，喷着口沫喊：“学校里刚死了人，你就跑人，你这不是故意增加学校的混乱，破坏革命吗！”我

义正词严大声说：“我在学校不跑，你们要将我打成反革命，要打断我的腿，要我的命。现在你给我听着，我不是反革命，跑到哪儿也不是——反——革——命——！”我的吼声震得王三头张口结舌，连连喊：“你，你——。”一个刚从外回来的管教，看到我这样放肆，拔出驳壳枪，用枪管顶着我的太阳穴，骂道：“你再不老实，毙了你！”我藐视他一眼，用中食指头拨开枪管，教训他说：“小青年，有本事上战场打敌人，别对我来这套！”‘喀哒’一声，那个管教打开枪的保险，二室管教一把将他拉走，场面尴尬地静下了。刘管事对我温和语气笑说：“你冷静一下，回学校好好向大家检讨一下。”他转脸对着王三头，严肃说：“他是我们这里人，家里还有亲人，你们要保证他路上生命安全，若有意外，我们要找你的。请签字吧！”王三头很不高兴地签了字，王三头说：“明天一早我们来提人。”王三头说完，不知谁，用电推子将我的头发推了个深深的十字。虽然“文革”期间设立的三打指挥部遭到否定，但我对我家乡《赣州城区三打指挥部》怀着感恩之情，特别对刘管事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更深表敬意。

次日天一亮，王三头等人用拇指粗的麻绳将我五花大绑捆住，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小爬虫”的木板牌子，给我的头上戴了一顶足有一尺高的纸做的帽子，跨出了大门。适逢昨晚用驳壳枪指着我的太阳穴的管教在大门口站岗，他用家乡话亲切告诫我：“婊子仔（用于我家乡熟朋友间的亲切称呼），路上多加只眼睛，不要让人害了。”我转身对着指挥部深深地鞠躬到地，纸做的高帽子从我头上掉落地上，王三头不得不从地上捡起那顶帽子，重重地戴在我头上。造反派对我的挂牌子游街示众，途经四省一市，长达数千里，足可载入《迪斯尼世界大纪录》。

我们一行人从东门外顺德门码头，上了由小拖轮拉着的驳船，船舱里有一排排长板凳的座位，我坐在一排座位的中间，两位工人左右紧紧夹住我，王三头坐在我后面一排的座位上，他的手抓住绑着我的绳子，我好像被船运去屠宰的一头牲口。船上旅客对我漠然视之，我感到很奇怪，像我这样五花大绑，胸前挂个大牌子的“犯人”，居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心里很有点失望，如果在我脊背后插上长长的木板条，搞一点新鲜的花招，也许会引人注目，取得侮辱人的轰动效果。

王三头到达赣州城后，还有一段插曲补充。王三头曾在我家院里举行了揭发我罪行的居民声讨大会，强迫我婶母站着陪斗。他首先横眉竖眼，语无伦次地大揭我的历史和现行“罪状”，然后要求我的邻居大胆揭发我的历史反革命事实，邻里乡亲们没人起立发言。王三头再三鼓劲，这时居民小组长陈嫂站起身说话，她的每一个字的发音都是斩钉截铁般的清楚，她严肃说：“我住在他家对过，只知道他从小到大学生，你揭发他解放前的事，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事不能乱说。”陈嫂的几句话把王三头顶得目瞪口呆，其他街坊也纷纷说：“我们不知道的事，不能信口胡说。”王三头认为在学校里对被揪出来的人，可以任意胡说八道，强加罪名予人。他在我的家乡着实碰了钉子，不得不灰溜溜走了。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